

头脑灵光的上海人也在从中寻找机会——他们很快适应了西人带来的电灯、电车、自来水，也接受了前所未闻的金融体系、保险业务，乃至开始学习西化的生活方式。

逊家族。

不独是富豪赚钱圣地，上海的十里洋场圆了许多人的淘金梦。根据美国经济史学家托马斯·罗斯基（Thomas G. Rawski）的计算，从1912到1927年，上海的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5%，这波工业化浪潮带来的高增长率，此后只有解放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改革开放可以比拟。

美国作家爱狄·米勒（G. E. Miller）在《上海：冒险家的乐园》中写道：“中国是一个优待外国人的乐园，而上海更是这个乐园中的乐园。到这里来的人，没有一个不尽量享用着那些特权。你可以任你的意来规定资本的数额，制定公司的章程，和经营你的正常的或者特殊的贸易。当局绝不会来调查你的业务，控制你的活动，或者干涉你与公众的交道的。这里没有铁板面孔的法律，没有各式各样的捐税，没有任何的拘禁。所以随便什么计划，此地都行得通。”

程乃珊也说到当时普通的外国人：“在老家他们可能只是一个平头百姓，没爵位，没学位，没钱财，出路狭隘。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，却因旧上海的崇洋心理，只要脑子灵，就可路路通，是上海给了他们机会和施展身手的平台。他们在上海租界安居乐业，享受着在他们老家只有贵族、有钱人才能享有的种种特权。”

曾在上海旅居多年的《密勒氏

评论报》主编约翰·本杰明·鲍威尔（John B. Powell）后来将自己的在华经历写成了一本《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》。书中提到，他刚从美国前来时下榻礼查饭店，后将妻女和妹妹也接来上海。“我刚到上海时，上海的美国人还很少，不过几百名罢了。后来，大量美国人在中国创设公司。于是，美国居民逐渐增多，美国人的社会活动随之得到相应的发展。这里的居民大多是首次来华的美国年轻夫妻。虽然环境不堪，但是在这里过得非常舒服。在美国时，这些太太既要一个人照顾孩子，又要为家务事操劳。来到中国，美国太太们意识到仆人随时恭候，她们感觉轻松了许多。在家里，我雇佣了五个人，其中包括一个厨师，一个打杂的，一个工人，两个女仆，

下图：1907年重建后的礼查饭店。



家人管女仆叫阿妈。”

来上海的美国年轻人，有的就职于领事馆，有的在商务厅办公室里当助理，还有的为上海的美国公司工作。二战前，最多的时候，上海已经有了十多万常住外国人口。鲍威尔还目睹了另一个外国人群体：白俄的流亡——由于当时到上海不需要护照和签证，大批白俄难民蜂拥而至。“这些前来上海的俄国人或坐火车，或乘轮船，不过大多身无分文。那时，从俄国到上海的火车很多，轮船也比比皆是，俄国人可以坐任何一辆火车，搭乘任何一条从北边来的轮船前往上海。这些前来上海的俄国人，贫贱至乞丐，高贵至沙皇贵族，囊括了俄国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物。”

到1930年，上海的白俄数量已经达到万人规模。“当时俄国人在上海影响颇大……屹立于上海的俄国教堂已达到12座，其中不乏宏伟壮观的。”最初，上海的慈善机构在部分市区广泛地设立施粥场，让这些俄国亡命徒不至于因长期忍冻挨饿而丧命。但，“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些蜂拥而至的俄国逃亡者并没有长期成为上海市的负担。相反，他们在上海有了立足之地，而且迅速站稳了脚跟”。

有些富裕的俄国人变卖珠宝，在上海住着豪华旅馆，过起了奢靡的生活；有些商人依然开店做生意，从杂货铺、时装店、美容店、女帽店到俄罗斯饭馆，琳琅满目无所不包，直到把“罗宋汤”都变成了上海菜的代表作；而哥萨克士兵则去给人当门卫当保安，“在俄国亡命徒的努力下，他们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，上海的西方白领和中国人无不